

我们一般会认为,美国巨型共同基金、投资公司、投资银行等是大量公司的“共同股东”,实际上,美国家族和个人才是隐藏在相互竞争的大量下游企业的“幕后”,并负责操盘下游企业集群最顶端的知识产权配置工作,决定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和内容,促使下游企业“攻防协作”,对经济发展贡献颇丰。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发展,美国的这一发展方式对我国完善“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结构”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知识产权 共同基金 基础设施

DOI:10.11842/chips.2016.04.011

没有通货膨胀,知识经济也会让“现金”贬值吗?*

——热带、亚热带没有美国知识经济兴起的“基础设施”

■ 本刊知识产权战略研究课题组

在任何国家,没有任何法律、政策、战略能尽善尽美、全知全能,而且大部分法律、政策、战略消耗的社会成本可能远超过其产生的社会收益。驱动各国“生产”法律、政策、战略的主要动力可能都是官僚热情(governmental ardor)而非市场需求,而且大部分社会收益可能产生于法律、政策、战略“忽略”的空白地带——即诺贝尔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地带”。毋庸置疑,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政策、战略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全知全能,而且随着内外因素发生变化,这种法律、政策、战略也需要适时调整。

从中美“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结构”的发展差异看,我们某些法律、政策、战略可能已非常有害。中原人民适合在这种法律、政策、战略发生失效、失活、更新的机遇期内,攀爬到我国“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结构”的顶层。

一、美国知识产权大案为何“静悄悄”

在美国,大部分科技型大企业都受控于各类机构

投资者,后者一般是投资基金或投资公司。这导致两家相互竞争的科技型大企业可能有很多“共同股东”,甚至有相同的董事,如苹果前 CEO 乔布斯曾宣称要对 Google 发起专利“核大战”,因为苹果一名核心董事“涉嫌”把苹果最核心的技术秘密泄露给了他最大的雇主——Google,帮助 Google 开发了与苹果 iOS、App Store 等类似的产品,但最后这种专利“核大战”并未爆发,而且苹果也没有对上述董事发起“刑事诉讼”。这是因为,从股权结构看,苹果、Google 有很多“后台老板”是同一组投资机构,这些机构则受控于同一个投资基金或信托基金,这些基金背后的出资人可能是同一个“美国家族”。这种家族不希望下游企业“闹事”,所以上述知识产权案件都没有爆发。

再如,美国波音、微软、Facebook、SalesForce 等公司都曾卷入非常严重的知识产权大案。东亚地区的三星、LG、华为、海尔、富士康、比亚迪、联想、瑞星等公司也曾卷入知识产权纠纷,在这些案件中,中、韩等东亚国家一般是抓捕、提出公诉,甚至判刑,而美

* 资料来源:标普网站、汤姆森-路透数据库、美国国会图书馆。



国上述知识产权大案最后都“静悄悄”地和解了。其主要原因也是涉案企业背后都有一些“共同股东”——即美国家族在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矛盾和冲突。每年，全美国因为知识产权案件受到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超过 100 人。这种表明，中美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上述“美国家族”隐藏在相互竞争的大量下游企业的“幕后”，但负责操盘“这些下游企业集群”最顶端的知识产权配置工作。它们也是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资产的真正买方。这些“美国家族”能驱动数千家，甚至数万家下游科技企业形成一致对外的“知识产权攻防协同”，形成良性、可控、和平的“内部知识产权扩散、共享和抄袭”，能把美国政府变成一个采集、分析、利用国外经济和科技情报的国内产业参谋部**，这可能是美国科技产业在过去数十年中逐步把欧洲、日本淘汰出局的根本原因之一。

与美国不同，中国的改革方向在削弱本土科技企业集群之间实施“内部知识产权扩散、共享和抄袭”的能力，甚至国有企业之间也在专注专利备战、专利诉讼、知识产权刑事诉讼。如果我们像美国那样，把科技产业“幕后”的“共同股东”从政府、国家更换为零散的“中国家庭”，那么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知识产权战略能成功吗？“中国家庭”能通过“竞价购买”巨型上市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股票，成为上述“共同股东”吗？在开放的股票市场，“中国家庭”能打得过“华尔街”的巨型基金吗？如果我们绕过“对市场基础产权实施向国民免费分光”的改革策略，那么我们的改革能成功吗？

二、美国知识产权企业集群如何实现“资本混血”

从表面上看，美国科技企业的“共同股东”主要是一些共同基金、投资公司、投资银行等。如共同基金（mutual funds，简称 MF）是一种专业化管理的投资资金，主要进行股票等证券投资——大量投资者把自己的钱汇聚起来，在基金管理人带领下，共同进入证券市场。MF 需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受董事会或信托理事会

监督，被《投资公司法（1940）》等成文法和普通法监管。

过去 40 多年中，美国上市公司总数在 4000—7500 家之间变化——这些“上市公司”创办、收购、入股、控制的下游企业数以十万计，但 MF 数量则持续增长。如 1980 年，美国 MF 有 564 家。1990 年，MF 超过 3000 家，2000、2001 年分别达到 8155、8305 家。截至 2015 年底，美国共同基金管理的资产达到 15.65 万亿美元，占据了全球共同基金资产的半壁江山。不过，美国共同基金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其管理的资产规模上，更表现在美国社会公众参与共同基金投资的广度与深度上。最新数据显示，超过 9000 万的美国居民、超过 5300 万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持有共同基金的家庭占美国家庭总数的 43%，持有共同基金的美国家庭中有 67% 将超过半数的金融资产配置于共同基金***。表 1 显示，美国 MF 管理的资金现已超过 15 万亿美元，股东账户超过 2.6 亿。相比之下，截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 2007 年 4 月 3 日，欧洲各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仅约 15.837 万亿美元，而美国证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仅约 15.684 万亿美元。

有些 MF 规模很大，而且业务很广。如 Vanguard 集团成立于 1975 年，2014 年管理资金超过 3 万亿美元，全球雇员超过 1.4 万人。其创始人是约翰（John C. Bogle），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时发现，如果 MF 同时在最大的 500 家公司投资，则 3/4 左右的基金挣不到钱，他还发现了很多影响投资决策的指数。因此，约翰为个人投资者创建了世界第一个“指数基金”，主要引导“散户”做股票投资。现在，威灵顿（Wellington）管理公司负责经营先锋（Vanguard）集团最大的两个共同基金——威灵顿（Wellington）基金和韦尔斯利（Wellesley）收入基金。

再如，富达（Fidelity）管理与研究公司成立于 1946 年，管理的资金超过 1.94 万亿美元。图 1 显示，Fidelity 在金融业务部门、Devonshire 部门都孵化了很多业务——如共同基金、人力资源外包等，还孵化了一些公司——如日本 KVVH。

** 如斯诺登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即 NSA）取得的反恐成果几乎是 0，其主要工作是采集各国经济、科技情报，为美国企业提供情报服务。

*** 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8-11/doc-ifyxunpy9224232.shtml>，2016-08-11。

黑岩 (Blackrock) 成立于 1988 年,管理的资金超过 4.59 万亿美元。黑岩的创始人有 8 位,其中 Fink 等 4 人曾在“波士顿第一基金”工作,并率先发展抵押证券业务,但 Fink 曾造成 1 亿多美元损失。后来,Fink 找到黑石集团 (Blackstone Group L.P.) 的 Peterson 求助,后者同意帮他发展风险管理业务。于是,Fink 联合其他创始人,开办了黑石金融管理公司,1992 年改名为“黑岩”。从图 2 看,黑岩开通了 5 大业务板块,其中 26 个共同基金在现金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生活方式基金市场 (life style funds) 都有很大的业务比重。

与上述基金公司不同,道富集团 (SSC:State Street Corp.) 主业是“托管银行”,副业是“共同基金”等。如 SSC 成立于 1792 年,其“托管银行”业务管理的资金超过 28 万亿美元,“共同基金”业务管理的资金约 2.345 万亿美元。

除了上述以做“共同基金”业务出名的投资公司,西方还有很多侧重发展非 MF 业务的投资公司、投资银行。如图 3 显示,这些机构管理着大笔投资基金,而且收入颇丰。

从图 4 看,巨型 MF、投资公司、投资银行等是大量科技公司的名义股东——而实际股东是基金的出资人,如黑石集团发行的第一个私募股权基金,吸纳了日兴证券、大都会人寿保险、通用电气 (GE) 和通用汽车退休基金在内 32 位投资者的出资。这类私募股权基金能进入数千家科技企业,这使黑石集团能充当大批企业的“共同股东”。

从图 5 看,上述巨型 MF、投资公司、投资银行等是大量公司名义上的“共同股东”——而真实的“共同股东”往往是个人、家庭。在美国,这种“共同股东”是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资产的主要买方。相比之下,日本的综合性大财阀是大量公司的“共同股东”,是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资产的主要买方。中国各级政府是大量企业的“共同股东”,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资产的主要买方是各级政府。

三、美国知识产权企业集群为何“很齐心”

从图 6 看,美国个人、家族之间的斡旋决定下游

表 1 美国 MF 的发展

年份	净资产 (单位:10 亿美元)	基金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东账户数量 (单位:千)
1940	\$0.45	68	—	296
1945	1.28	73	—	498
1950	2.53	98	—	939
1955	7.84	125	—	2085
1960	17.03	161	—	4898
1965	35.22	170	—	6709
1970	47.62	361	—	10690
1975	45.87	426	—	9876
1976	51.28	452	—	9060
1977	48.94	477	—	8693
1978	55.84	505	—	8658
1979	94.51	526	—	9790
1980	134.76	564	—	12088
1981	241.37	665	—	17499
1982	296.68	857	—	21448
1983	292.99	1026	—	24605
1984	370.68	1243	1243	27636
1985	495.39	1528	1528	34098
1986	715.67	1835	1835	45374
1987	769.17	2312	2312	53717
1988	809.37	2737	2737	54056
1989	980.67	2935	2935	57560
1990	1065.19	3079	3177	61948
1991	1393.19	3403	3587	68332
1992	1642.54	3824	4208	79931
1993	2069.96	4534	5562	94015
1994	2155.32	5325	7697	114383
1995	2811.29	5725	9007	131219
1996	3525.80	6248	10352	149933
1997	4468.20	6684	12002	170299
1998	5525.21	7314	13720	194029
1999	6846.34	7791	15262	226212
2000	6964.63	8155	16738	244705
2001	6974.91	8305	18022	248701
2002	6383.48	8243	18983	251123
2003	7402.42	8125	19317	260698
2004	8095.45	8042	20035	269468
2005	8891.11	7974	20548	275479
2006	10397.88	8117	21249	288594
2007	11999.73	8023	21610	292553
2008	9602.57	8019	22232	264597
2009	11112.67	7659	21661	269449
2010	11831.33	7548	21907	291299
2011	11626.49	7580	22249	272628
2012	13043.67	7582	22605	257074
2013	15017.68	7707	23353	264848
2014	1585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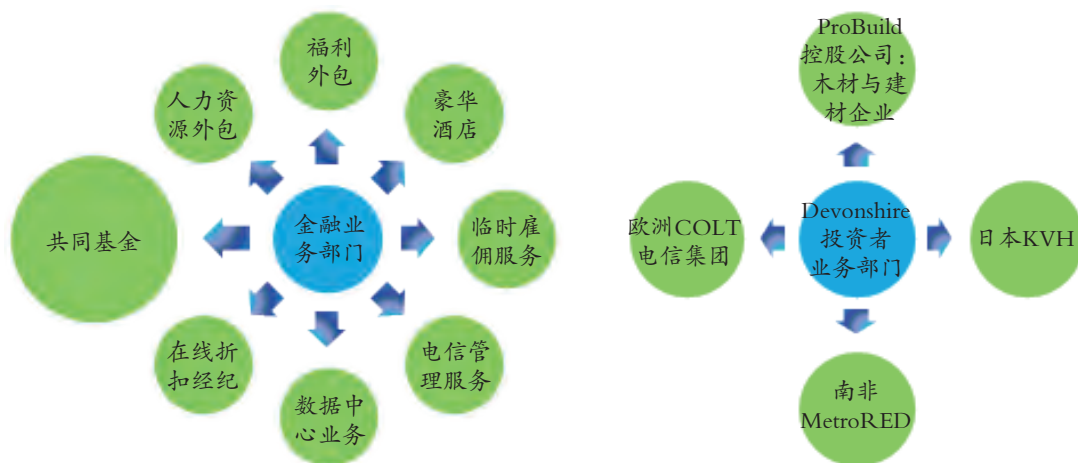


图1 Fidelity孵化的业务部门和下游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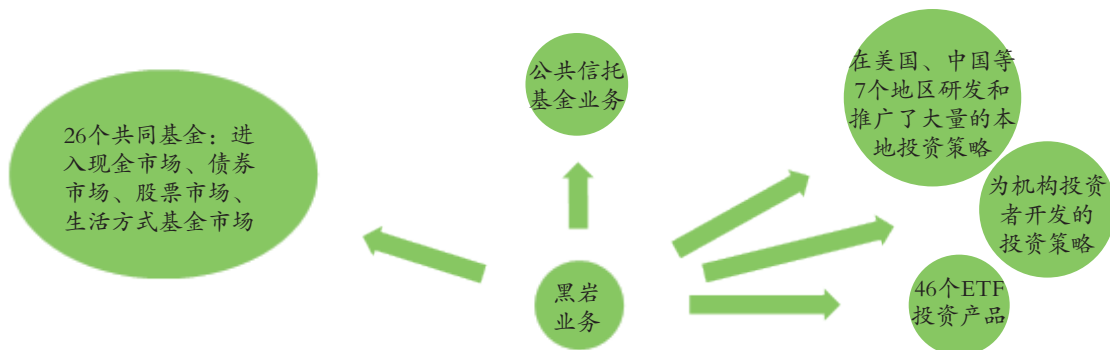


图2 黑岩的四大业务板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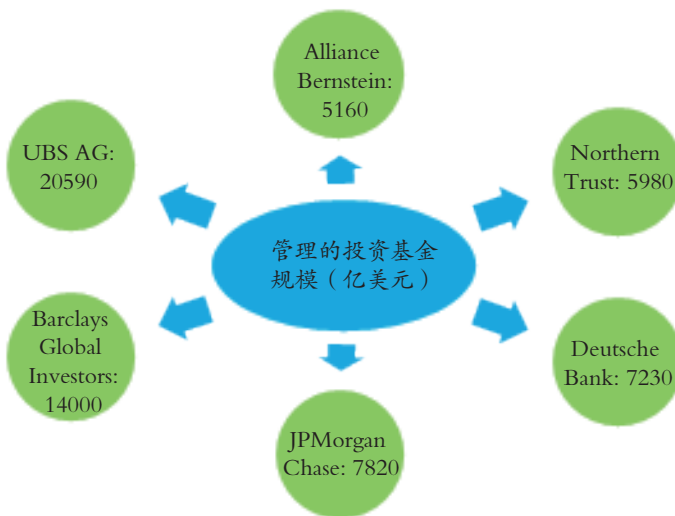


图3.1 进行股权投资的著名机构



图3.2 部分股权投资机构的收益

图3 其他部分投资机构的情况 ****

企业的“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的模式和内容，能导致大批科技企业“齐心”协作。中国缺乏上述斡旋，巨

型国有企事业单位“整体上市”则把“中国肥羊”从隐蔽的“旧体制丛林”一只只驱赶到空旷的“资本市场”

**** <http://finance.mapsofworld.com/investment/banks/top-10-bank.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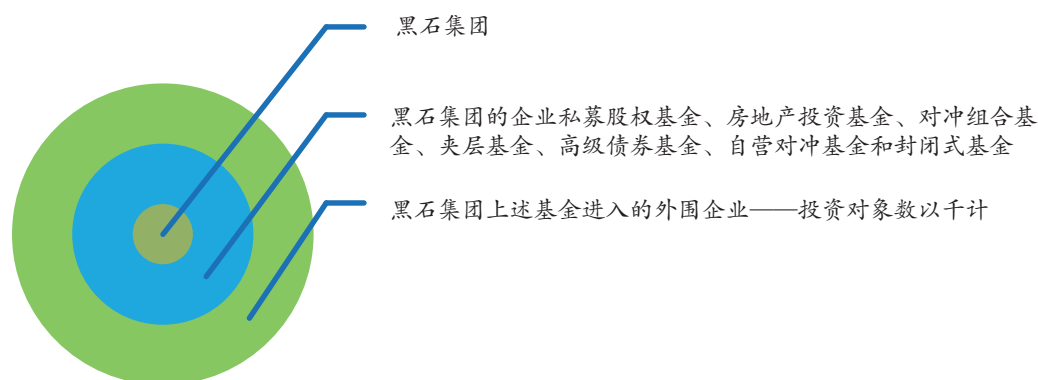


图4 黑石集团是大量企业的“共同股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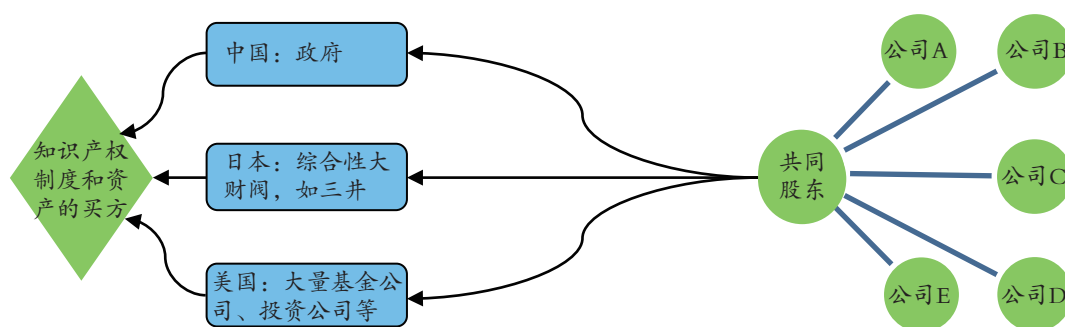


图5 中、日、美三国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资产的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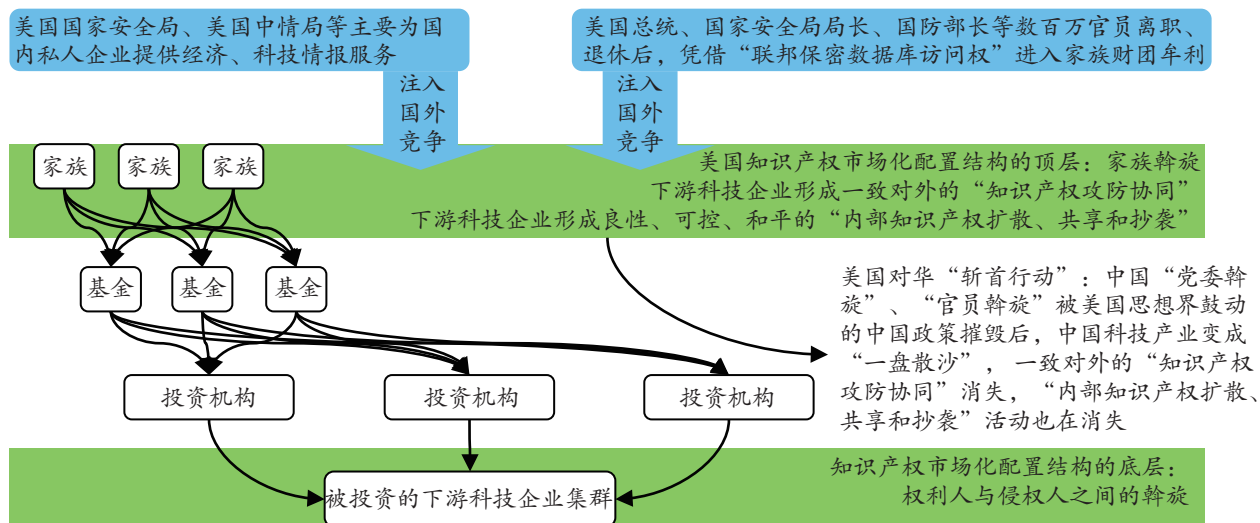


图6 美国一面维护其“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结构”，一面对华实施“斩首行动”

原野。这样，华尔街“金融狼群”对中国科技产业实施资本围猎的契机就来到了（见图6）。

我们的改革路线侧重把最核心的国有科技产业抛向对华尔街“金融狼群”开放的资本市场，这种改革其实很难实现“藏富于民”、“藏技于民”，可能不会像俄

罗斯把土地产权、房屋产权、企业产权免费分给国内人民那样更容易取得成功。历史经验证明，那些在中国国内市场的本土私营家族企业更容易时刻保持清醒，能够对外竞争对手能时刻保持有效的“攻防队形”。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改革侧重基础产权、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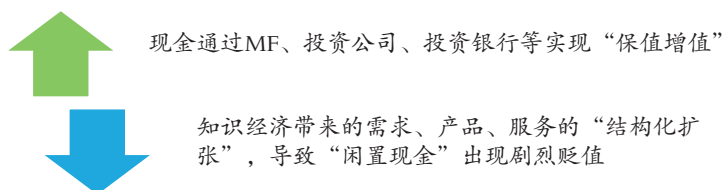


图7 现金贬值的机制

础权力的初始配置，侧重发展个人为主的买方市场，有利于民营企业在自由竞争中崛起；之后，中国改革侧重基础产权、基础权力的政府配置，侧重发展官办机构主导的卖方市场，有利于公办企业发展，也有利于政府筛选、过滤后的少量民营寡头发展。中国近十多年兴起的知识产权制度，近十多年涌现的知识产权资产其实主要是政府作为“买方”先设计、定制、购买进来，然后统一销售给全社会，让社会统一购买它的知识产权司法制度、宇航知识产权资产等。无论这种“把鸡蛋装进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是否合理、正确，它至少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加剧了中国发展的刚性，减少了它实施“软着陆”的机会。

从美国历史看，它总是在“柔性发展”，几乎不会碰上“硬着陆”风险，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从中国历史经验看，它总是在“刚性发展”，会有一些“硬着陆”的风险。要解决这种问题，中国可能需要把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资产的“买方”从政府更换为日本那种财阀，或美国那种家族。

四、美国知识产权企业集群如何“造福股东”

美国个人、家庭、企业把大量金融资产交给私营投资公司、私营投资银行去打理，其风险其实也很大，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庞氏骗局”多如牛毛，金融行业的骗局影响更大，如犹太裔商人伯纳德·麦道夫曾设计一个“庞氏骗局*****”，先把一批犹太富豪骗进来，然后又把汇丰银行等一大批世界顶级投资机构骗进来，给各国投资人造成了500多亿美元的损失。我国某地一名

首富的500亿元字画项目也被一些专家看做“庞氏骗局”——强行或恶意预设其他人的“未来决策”，并借助这种决策谋求当前利益的制度或商业安排都算“庞氏骗局”。此外，前苏联大部分制度设计，我国大部分高回报的融资项目，以及阿里巴巴余额宝、中国教育制度、中国股市、中国社保制度、中国高地价托举的房地产业、美联储国债制度、美国地方政府债券制度、美元制度等也被一些专家当做“庞氏骗局”来研究。这些研究确立的前提——如“阿里巴巴余额宝是庞氏骗局”等——可能完全错误，其结论也可能完全错误，但这种研究能帮助我们预测制度或商业安排出现“运转失灵”的机制，并提早进行防范。

什么力量让人们不怕各种“庞氏骗局”，纷纷把现金转化为高风险的金融资产呢？从图7看，即使没有通货膨胀，知识经济带来的需求、产品、服务的“结构化扩张”，也会导致“闲置现金”出现剧烈贬值。因此，为了避免这种贬值，人们只能持有少量现金，使大部分金融资产进入高风险的投资领域。

大部分美国人民可能沦为各种“庞氏骗局”的附庸，成为美国金融资本的奴仆。尽管如此，借助美国资本体系这个美国知识经济兴起的“基础设施”，美国大部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风险科技投资完成整个运转过程。美国人民从这个体系“生产”的科技投资、科技股票获得了巨大收益，如2012年，苹果公司曾发布2000多亿美元的股东分红和股票回购方案，在此之前，该公司已执行过多个上百亿美元的股东回报方案。微软、苹果、Facebook的股票对很多股东的回报率超过100倍，甚至上千倍。

五、我国知识经济兴起的“基础设施”去哪儿

五、我国知识经济兴起的“基础设施”去哪儿

在地理布局上，美国上述“基础设施”主要位于波士顿、纽约那种寒冷的美国沿海地区。这种布局是“哈耶克秩序”的产物，符合孟德斯鸠对寒冷地区国民性格、

***** 1960年，从法学院毕业后，他拿着自己在海滩上做救生员赚来的5000美元创立了伯纳德·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并因此闻名华尔街。这家公司主要以担任股票买卖的中间人而闻名。2001年，麦道夫公司被称为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三大提供上市咨询的经纪公司之一，是纽交所第三大经纪公司。因为设计一种庞氏骗局（层压式投资骗局），他令不少著名投资者金融机构损失500多亿美元。



国民能力的分析结论。

我国的出路不在于躲避华尔街“金融狼群”的攻击，而在于让中国具有坚强向上性格的本土社群在美国波士顿、纽约那种寒冷的沿海地区建立上述“基础设施”，并在这种设施上更新我国“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的结构”。如我国中原地区身处“四战之地”，地缘环境最为恶劣，但其土层肥厚，气候湿润，人口产量很大，还孕育了道家、儒家、法家、客家文化等*****。从历史角度看，中原地区虽盛产信仰、思想、规划、学说、商业模式。中原人民可能像犹太人那样擅长发明“庞氏骗局”，但他们缔造的信仰、思想、规划、学说、商业模式会给国家带来持久繁荣。

中原人民到了任何地方都能很快融合本地市场和文化，并创立新的“商业模式”，借助市场交易谋生，中原地区的“大商人”在外地搞的大项目普遍能坚守

人性底线，敢于对公众开放办公场所，其产品能承载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从文化厚度看，中原人民最适合占据我国知识产权市场化配置结构的顶层。

我国渤海、黄海沿岸有很多村落的碑刻记载其祖先来自中原。兼重清史等专家曾指出，我国北方沿海有些县市约90%以上人口宣称其祖先来自中原地区。现在，北方沿海很多新楼盘、新社区大部分被“中原新移民”占据。根据孟德斯鸠、哈耶克的理论，在这类寒冷的沿海地区开设新的资本市场，推动“中原新老移民”在我国这种地区兴建上述“基础设施”，这可能是我国应尽早实行的一项重大国策。在热带、亚热带部署上述“基础设施”，这不符合所有世界大国的发展逻辑。一个大国如果缺乏这种“基础设施”，那么其任何科技创新战略、知识产权战略都不会取得成功。

***** “道家先圣”老子、庄子均来自中原地区；“儒家三贤”微子、箕子、比干都来自中原。

Can Knowledge-based Economy Make "Cash" Depreciate Without Inflatio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Infrastructure" Without the Rise of US Knowledge Economy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Research Team of this Journal

Abstract: Generally, we believe that the US giant mutual funds, investment companies and investment banks are "common shareholders" of a large number of companies. In fact, the American family and the individual are "behind the scenes" hidden in a large number of competing downstream businesses, and are responsible for IP configuration work of trader downstream business clusters top. They decided to market allo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ontent to facilitate the downstream business, "Defense cooperation",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atly.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domes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wa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China to improve the "market allo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Key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mutual fund; infrastructure

(责任编辑:唐佩佩 何岸波;责任译审:龚宇)